

第一章

革故鼎新

翻译与语言革新和社会变革

导 言

与西方的先发性现代性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是后发的、非原生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坚枪利炮把国人从梦中惊醒，经历了一次次的战败，中国是“天朝上国”“天下之中央”的幻觉为之破灭。中国一批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希望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通过改革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由于当时之中国闭塞贫穷，民众觉悟滞后，为了加速现代化进程，一批知识分子和改革者通过翻译西方的各类经典，掀开了构建现代中国的序幕。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翻译对中国的语言革新、文学改造和社会变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现代性离不开翻译。

本章以严复、梁启超和鲁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为中心来探讨翻译之于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性。严复的“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人们对“信、达、雅”的误解却屡见不鲜。我们对严复所提出的翻译标准的理解不应人云亦云，而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避免以外来的文化和理论为基准，歪曲和误解中国本土的译学资源，应使翻译理论获得后起的生命。严复关于翻译的美学标准背后亦隐藏着对当时中国前途的忧虑，他译《天演论》，略去伦理而凸显进化，是以宣传进化思想，唤醒国人之觉悟和奋斗之精神为第一要务。他要举起文化传播和科学启蒙的火炬，照明当时封建蒙昧的中国和混混沌沌的百姓。

梁启超在经历了维新变法的失败后，认识到翻译乃文化之利剑，开始转向文学，以翻译西方小说为手段来引进

西方的启蒙思想，改造社会。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将政学放在艺学之前，通过翻译来达到政治改良的目的。他强调翻译小说的重要性，提倡政治小说的翻译，又通过日文转译，借西方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来达到以文治国，最终达到启迪民智的目的。他的翻译实践有四个特色：取政治小说为译本，从日文转译西学，进行翻译的操控和改写，通过新闻报刊来发表译文。其翻译理论以深厚的佛学为基础，对今天的译学研究仍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他的翻译实践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反映了 20 世纪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追求民主的心路历程。

鲁迅通过翻译来引进西方文化，变革中国文学，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社会，改造落后国民性的目的。变革中国的文学，必须从变革语言入手；变革语言，又需要从翻译入手，“硬译”便成为语言变革的暴力手段，而从“硬译”到“易解”是这种暴力品格的继承和发展。在鲁迅看来，唯有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西方文化才能够被真正引进到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鲁迅的翻译理论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他提倡的“硬译”和“易解”互为统一，在他所追寻的翻译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即通过翻译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彰显了重要作用。

早期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很多都是翻译家，他们处于中西文化的交界处，既拥有中国的思想智慧，又拥有西方的启蒙理性，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借鉴，将开启民智之“火种”播撒在民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推动了中国的语言革新和社会变革，起到了革故鼎新的作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第一节

解构“信、达、雅”：翻译理论后起的生命 ——评叶维廉《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

1. 引言

《中外文学》1994年第4期刊载了叶维廉先生《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一文，作者的用意是要破除对严复“信、达、雅”的迷信，赋翻译以后起的生命。作者认为，“信、达、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翻译变成了机械的语言活动，毫无创造性（生命）可言，所以，应该对其进行批判。¹叶先生的批评对那些信奉“信、达、雅”的机械论者不无道理，然而，对严复和他的“信、达、雅”标准却显得十分武断。本文作者将就叶先生这一文章进行评论，阐释和解构“信、达、雅”，赋这一理论以后起的生命。

叶维廉先生显然是站在文艺翻译学派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在方法上深受西方文论家的影响。他认为，必须要解构对“信、达、雅”的迷思，因为“信、达、雅”有如杀鸡取卵，完全不了解文学上造“意”与传“意”的叠合交错的复旨，完全不了解美感之经验不能以“内容”来概括，“幼稚地把艺术的传达看作是一种‘饼—手—饼’的过程”。²作者从而得出结论：“‘信、达、雅’之说实在是粗糙而缺乏灵识。”³

1 参见叶维廉，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中外文学》1994年第4期，第74-86页。

2 同上，第74-75页。

3 同上，第75页。

2. 关于“信”的批评

叶先生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信、达”之上，他认为，“雅”已为众人所非议，无须再论。在对“信”的再思中，叶先生有三点诘问：1）“共同人性”与“共同心理结构”是按哪一种文化基点去决定的？2）作者的思想与意图可以圈定吗？3）如何超越作者和读者不同的历史性？叶先生从这三点得出一个结论：“‘重建作者原意’，‘客观的诠释’，‘意义可复制性’和‘所谓理想的读者’（信）是一种迷思。”⁴

由此可以看出，叶先生对“信”的批判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即在对“信”的问题上，严复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如出一辙。叶先生提到，“信”乃重建作者的原意，西人有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狄尔泰（W. Dilthey）以及赫希（E. D. Hirsch）等相信“标准”“客观”的诠释论者，他们心中有一个假定：作者的心理和思境可以重建。他们的理论上承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logos）和亚里士多德的所谓“逻辑的结构”“普遍的结构”，下接康德在自然科学冲击下提出的知识论。“但人文的思维活动可以有科学一般的准确性吗？”⁵叶先生问道。然而，这恰恰是我们要进行反问的。我们要问：严复什么时候作过这样的断言？难道这个问题是叶先生对严复提出的“信”所作出的诠释吗？在讨论严复的“信”的标准时，只字不提“信”的定义，避开严复提出“信、达、雅”的背景和思想根源，却侈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此来界定“信”，这一做法不可取，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严复译书，曾研究过汉晋六朝的译经方法，深受鸠摩罗什的影响。鸠摩罗什在译经中力求译文典雅，但又不损原意，他在论及佛典翻译时提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选弦为善。凡覲国王，

4 参见叶维廉，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中外文学》1994年第4期，第78页。

5 同上，第77页。

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⁶严复《译例言》里引有鸠摩罗什“学我者病”一语，可见佛经翻译对严复的影响是较大的，对此，梁启超、鲁迅等都有过论述，而叶先生却只字不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严复从未有过从人文思维活动中来获取科学一般的准确性的企图。让我们看看严复是怎样探讨“信、达、雅”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⁷由此可见，严复将作文之法则运用到翻译之中。作文之道，抒发己见，贵在求信，求达，求雅。作文与翻译，两者之间有着相通之处。严复首标“信”义，要求意义不悖本文，这是因为翻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但它与创作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在翻译时，要强调“信”。“信”与“达”相辅相成。他又说，“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⁸可见，严复并非要追求某种一般科学的准确性，或追求某种绝对真理。在通常情况下，他坚持“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特殊情况下，他又可能以“达旨”辅之。他在《译例言》中补充说：“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⁹所以，说严复把艺术的传递过程看作是一种“饼一手一饼”的活动，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6 释僧祐，《鸠摩罗什传第一》，载（梁）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鍊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34页。

7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322页。

8 同上，第1321页。

9 同上，第1321页。

3. 关于“达”的批评

叶先生对“达”的挑战也比较勉强。他说：“退一步说，就算译者可以完全掌握原作全面的思维状态与境象（譬如作者本人自译——其实有不少例子流露出作者对自己作品不尽知的情况，如‘神来之笔’这句话所暗示的），也不能保证传达之完全。最显著的是：两个文化的心理、语言的图构的差距构成种种限制，逼使他（她）做出种种的调整和割舍；这里包括观、感主场的差距，构思策略的分歧，语言默契事象联想网路的相异，在很多地方，逼得译者必须作种种发明或另辟途径。”¹⁰对此，笔者持相同意见，且认为，严复的“达”并不与叶先生所说的相悖。从某种意义上说，叶先生所说的恰是严复在翻译中所刻意追求的。如中西语言有异，在结构、意象等方面都难一一对应，如何在翻译中做到“达”，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经，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¹¹由此可见，严复所说的“达”，并非要字字对应，而是可以“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他称之为“达旨”翻译。我们可以用他译《天演论》来论证。

首先，看严复是如何译该书书名的。原书名为 *Evolution and Ethics*，鉴于伦理之念在当时不是当务之急，而宣传进化思想，唤醒国人之觉悟和奋斗之精神乃是第一重要的。于是，严复所遵循的完全不是现时的狭隘的“信、达、雅”标准观（狭隘的、

10 叶维廉，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中外文学》1994年第4期，第78-79页。

11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321页。

机械的“信、达、雅”才是叶维廉先生该真正去批判的)，他略去伦理以凸显进化，译者之匠心与主体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显证。吴汝伦在《〈天演论〉序》中说：“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¹²

然后，我们再看看严复的“取便译法”是如何在原文首段的前两句中得到体现的。严复深知，除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方面存在差异外，中外文字的差别也常常令翻译家感到棘手，在翻译时必然要徘徊于“循华文而失西义”与“循西文而梗华读”之间，其结果就会是要么不“信”，要么不“达”。优秀的翻译家在精通中外文字之差异和对原作“神理”有透彻的把握的基础上，会无所顾忌地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进行翻译，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因此，他毫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为了达旨而采取了种种变通的译法，让原著的史书般的恢宏和典雅的风貌跃然于译文之上。

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 Except, it may be, by rais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 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 here and there, break 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 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 and the 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 shelving sides of the c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¹³

12 吴汝伦，《天演论》序，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318页。

13 参见 T. H. Huxley, *Prolegomena I, Evolution &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901.

译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¹⁴

译文初始便给我们一惊。原文的第一人称在译文中变成了第三人称，以突出原作的诗史风格。为了话语的连接和承上启下，译者增添了诸如“背山而面野”“罗马大将”“如今日者”和“历历如在几下”等附益性的阐释短语。而译文的句式结构的变化更令人捉摸不定。严复已将原文的句子结构和形式化解，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神会，毫无拘束地重新组织，把原文的两个英文长句在译文中由五个汉语短句构成，以符合汉语的习惯。句子中有不少的四字短语，铿锵有力，典雅耐读。读过译文者，无不称赞译者的神来之笔。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还引用了艾略特的一句话来作为批评“达”的根据：“批评理论常犯的错误之一，便是假想在一边只有‘一’个作者，在另一边只有‘一’个读者。”¹⁵此言似不恰当。严复的翻译绝不是面向一个读者，而是千千万万的读者；他不仅仅想让一个声音说话，还要借作者之声，发己之振聋发聩的呼号。他要举起文化传播和科学启蒙的火炬，照明当时的封建蒙昧的中国和昏昏沌沌的百姓。就这一点而论，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少有人能与其相提并论。

4. 对“信、达、雅”的解构

在完成对“信、达”的批评之后，叶先生以异花受精和异

14 严复，《天演论》导言一：察变，载王栻编，《严复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323页。

15 叶维廉，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中外文学》1994年第4期，第78页。

种繁殖来描述翻译。他认为,“与其在‘信、达、雅’上做文章,反不如把翻译的艺术讨论和翻译的实践视为两种文化对话所必然产生的不安(这包括外来文化入侵所引起的本源文化的边缘化)和从而得出打开视野,扩展感受网,扩展表达潜能和逼我们反思自己文化中的优异与弱点的一种活动。”¹⁶

其实,严复在这一点上比谁都玩得老到。他“自十四五岁起,便到船政学堂学科学技术;二十五岁后,又到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物制度,阅读亚当·斯密、边沁、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回国以后,他虽然在海军界服务,但过的仍是学校生活。他除了发愤钻研中国旧籍以外,仍孜孜不倦地继续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学说,追求西方国家所以富强并横行五洲的基本原因。我们可以大胆地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时,这一位四十三岁的北洋水师学堂校长,对于西洋学问造诣之深,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那些甲午战争前曾经到过外国的维新运动人物,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之流,甲午战争后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们,也都不能望其项背。”¹⁷正因为严复具备了上述可贵的素质,所以,他能在翻译中进行时空转换,移花接木,其有些做法,甚至令今日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者为之瞠目。¹⁸他一反常规,以文化导入为主,对两种文化对话所产生的不安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传统的观点把原作与译作的关系看作是主仆的关系,在这一前提下,翻译得格外谨慎地进行,不敢越过雷池半步。严复在翻译中,为了让译文产生更大的社

16 叶维廉,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中外文学》1994年第4期,第82页。

17 王栻,严复与严译名著,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4页。

18 参见梁立坚,各凭才情,赋予生机:论“达旨式”的翻译,载国立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编,《展望二十一世纪翻译理论》,1997。